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13位ISBN编号：9787532928064

10位ISBN编号：753292806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葛红兵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为作者近年学术论文精选，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和主要思想观念。

“e批评丛书”是一套关于几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

由十位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评家所著，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鉴。

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评笔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独特、或严谨扎实、或自由放达，从不同的视角或层面来切入当下的文学创作，表达诉说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良知、正义、职责以及对于当前的文学现象、文学性质、文学发展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与鲜明立场，撇开浮沫，洞入真知，再现了当下文学的本真状态与精神走向。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作者简介

葛红兵，1968年生，文学博士，教授。

1987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系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家，多次出访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等地讲学、交流。

主要学术代表作：《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障碍与认同—中国当代文化问题》、《文学史学》、《身体政治》、《正午的诗学》等，主要小说代表作有《未来军团》、《财道》、《沙床》等，另有《葛红兵文集》（二卷）、《葛红兵中短篇小说佳作选》、自选随笔集《人为与人言》、《横眼竖看》、《中国思想的底线》等出版。

本书为作者近年学术论文精选，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和主要思想观念。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书籍目录

瞧，他们走来了——“e批评丛书”总序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发声，还是沉默？

意象主义写作直译都市民间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个体文化时代及其批评策略重温1988：全球化时代“人道主义”何为？

论道德批评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反思论恐怖论争执论悔恨论群集异见模式的缺乏、奇观模式的泛滥、深度模式的平庸——中国电影的总体危机中国文学与中国梦多媒体时代的批评标准关于当下小说创作类型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有文化共识才有文化发展病重的中国——“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体”隐喻中国思想的一个原初立场——公元3世纪前中国思想中的“身”观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饥饿”的文化图谱作为“性”的身体身体伦理学——伦理奠基于身体之上是否可能？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章节摘录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问题 中国文学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

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

人们一直存在争议。

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

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

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

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

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

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

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

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

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

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

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

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

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

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

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

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去，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

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

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

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一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

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

显然，五四人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

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式，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

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

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

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

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

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的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模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

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

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

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

是的，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

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

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健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

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

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订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

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

”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

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

”（《危机！

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年轻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不仅仅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

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

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

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

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茅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

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

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

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

”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